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目 录

- 芦沟桥事变亲历记……………刘徽华（1）
- “七·七”事变亲历记……………王景祿（10）
- 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一八四师禹王山
阻击战……………李佐、赵汝懋、常绍群（15）
- 五十八军在湘、赣、粤边区抗战之回忆……………鲁元（32）
- 我参加徐州会战的回忆……………赵堪同（44）
- 抗战时期防守滇南的第一集团军……………严中英（51）
- 中美空军在云南的抗战……………马肇元（83）
- 我参加中美空军抗战的经历……………王同星（88）
- 从防空准备到第一次空袭……………万揆一（116）
- 回忆航特旅第五团在昆明片断……………曹觉迟（124）
- 沦陷的前夕……………寸树声（132）
- 收复腾冲之战……………方诚（138）
- 抗日战争中收复龙陵、芒市、遮放、畹町
的回忆……………熊新民（143）

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	崔继圣	(155)
参加滇缅边境游击的回顾·····	王国伟	(170)
国民党第二军驻防滇西活动情况·····	黄文涛	(172)
收复芒市之战·····	许家春	(178)
在松山战役中炮兵的使用·····	宋保恒	(180)
回顾我到滇西抗日的历程·····	冯国真	(189)
滇缅公路·····	浦光宗	(235)
抗日战争中修通中印公路史略·····	杨钜廷	(247)
赴缅抢运抗日物资的经过·····	吴击楫	(253)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始末·····	冯君锐	(259)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光辉业绩·····	廖文仲	(283)
一个“南侨机工”的回忆·····	罗杰	(287)
回忆战斗抢运在睦南关的日日夜夜·····	张子霖	(291)
华侨在滇西抗战中的贡献·····	杨发恩	(295)
抗日战争时期的缅甸华侨·····	董孟雄	(303)
六库地区的积谷支援抗战·····	马秉坤	(329)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的 回忆·····	祝发清	(333)

芦沟桥事变亲历记

刘徵华

日寇侵华，国家危殆。为了救亡图存，无数青年走上参军道路。我本人也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去学军。1934年毕业后，到北方参加二十九军抗日。当时军队还驻在张家口。以后军部移防北平南苑，三十七师冯治安师长兼任河北省主席，三十八师张自忠师长兼任天津市市长，宋哲元军长掌管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天津三十八师小站防区，我亲自抓获日寇派来的间谍，在他的背囊内，搜出一些测绘图。我在三十八师大专学生军训总队教育处工作时，有日寇间谍混入我野外演习队中，刺探我集训情况。日寇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捣乱破坏。

1937年7月初，经常接到驻北平、我军军部和三十七师的通报，得知驻北平城内外的日寇与我人民矛盾更深，与我驻军磨擦更为剧烈。各种各样的小事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日寇虎视眈眈，侵扰事件有增无已。这时张自忠师长召见我，传达了上级指示，并告诉我已调为少校团副。等赴北平完成了联络参谋官任务后，即回津到职。

我7月4日到北平，向副军长董麟阁和师长冯治安报到。他们向我介绍了日寇连日来从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向北平增兵情况。并说，据报天津军区也有日军增派军队进驻其大本营海光寺，并分驻各地等情况。我把由津带来的我军当前驻防图，呈递他们。他们边看，边指示我应到北平城

郊观察一下我军防地和北平居民的情况。最后，要我住在长辛店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吉星文团部，并多来往于该团驻宛平城内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加强与吉团长、金营长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好日军寻衅闹事、制造磨擦等应变问题。我告退后，直奔长辛店吉星文团。

7月5日，我去到宛平城会见了金振中营长，并拜会了王冷斋县长。他们把我当作老友看待，即时介绍了宛平城，芦沟桥外围日寇情况。翌日清早，出早操时，我跟在队伍后面，与士兵一起打野操。于收操时，亲眼看见两军收操相遇，各不让路，日军官抽出战刀，用刀背劈打我士兵，我士兵也用枪托毆打日军官的坐马，并使其从马背上摔下地，日兵抢掠我士兵军衣、军帽，我士兵丝毫不退让。

当天，我又去北平城里，到东西三条附近时，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作恶多端的实况。

7月7日上午，我回到宛平城第一营。金振中营长说，他在下午有事要回北平家里一转。他要我给士兵讲讲平津两地的形势。我在讲话中首先提到平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士气、民气空前旺盛，这是克敌制胜的支柱，也就是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尤其我二十九军士兵，直、鲁、豫人数居多，身体素质极好，刀法、枪法，闻名中外，我们学军时的军事体育部向二十九军聘请教官担任。刚说到这里，忽有士兵来报，日军演习，比往常收操更晚，而且更接近城郊，不知有何企图，我们正在判断敌情时，金振中营长忽然转回营部说，听到城郊还有战车声，并亲眼看到日兵在炮兵配合下，似以宛平城做假想敌，急速接近我军防区。察其迹象，与往常大不同。当时我们都以日军行动不平常，应速令城内和芦沟桥守军密切

监视、并即刻作好战斗准备、晚10时左右，忽然接到绥署电话，询及日方提出，他们有一演习士兵被我俘入宛平城，有无此事？金营长回答，决无此事。显然是日寇阴谋向我挑衅。话还未落、忽然听到日军枪声大作，判明鬼子来势不善。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刻组成战斗指挥所，马上进入阵地，下达战斗命令、要求官兵奋勇杀敌，不可迟疑动摇。同时我们用电话报告了吉星文团长。吉指示，坚决击退来犯之敌，做到寸土不让，这时战士已准备完毕，侵敌进到百米距离，立即猛烈回击，使敌人不敢冒进。过了片刻，日军连续开炮，击毁了我军营房，并炸死我士兵多人。我即时予以还击，第一炮就炸得鬼子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又过片刻，两军都发起强攻，我士兵奋不顾身，首先发出冲锋号令，立刻进入白刃战，一直厮杀到半夜，两方都伤亡惨重。天亮后，鬼子由于夜袭败北，弃甲曳兵而逃，便又拾起谈判的幌子，由其头目樱井德太郎顾问和松井、辅佐寺平等人以谈判代表身分，强迫我方把守军退出宛平和芦沟桥以西10华里，接受日方的搜查。另外，又提出必须惩办事变的祸首，并赔偿昨夜日军人员武器装备的损失。我方参加谈判的人有金营长、王冷斋和我，我们一致严辞驳斥了日方的无理要求。谴责日方的挑衅行为，要求日方应赔偿我方的重大损失。

7月8日凌晨，日军以一个加强大队，在其大队长一本清直的率领下，分三路向我宛平城芦沟桥三营守军进犯，另以一部迂回至宛平城西南向我长辛店二一九团吉星文团部和一二营前沿阵地发起攻势，对我宛平城的袭击，尤为猛烈；我炮兵还击，给敌人以重创。这次战斗，双方伤亡都很重大，宛平城内居民死伤也多。在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时刻，老百姓

送饭、送水、送慰劳品及运送伤员等支援活动，毫不松懈。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见我军不为武力所压倒，便又提出双方军队统统后撤，宛平城居民也要退出城外。我方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头目刚走不久，我三十七师何基澧一一〇旅赶到，以压倒优势的生力军力量，连夜组织了对铁路附近日军的夜袭，将其一举歼灭。从此何旅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军士兵的斗志。

7月9日，日军又向我宛平城发炮数百发；企图把宛平城夷为平地。我守军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和誓与重镇共存亡的决心，英勇奋战，粉碎了日寇的狂妄野心。在炮战暂停时，有几个在我指挥所担任警戒的士兵讲，连日来看到日寇是靠大炮吓人，我们就要以白刃大刀片取胜。如今战斗已经打响，只有多砍鬼子的人头，他们才知道中国军队的大刀是不吃素的。把中国人逼上绝路，就会叫鬼子人头落地。他们几个人，身背长枪，手持大刀，声言今晚要搞一次偷袭，提着日寇人头回来谢刀。说完，他们擦衣卷袖而去，直到深夜，果然提回两颗日寇人头，自豪地说：“我们拿回了战利品”。此一壮举，当时传遍全军，人人感到，我们有这样赤胆忠心的勇士，中国决不会亡！

7月10日，沙岗一带之敌，又发起攻击。而我五里店、大井村以及回龙庙铁路桥附近，两军仍然对峙，战斗一触即发。但看到军、师摘录的战斗简报说，有大批日军从榆关沿北宁路经天津开来北平，从古北口、蓟县开来大队日军，正向北平急行军前进。特别从塘沽沿海河开来天津海光寺兵营的日军队伍，还随带很多辎重部队，战斗的规模将更加扩大。我们正在议论这些战况时，吉星文团部忽然转来通知，要我

急速回到军部接受重要任务。我奉命后，骑自行车路经卢沟桥时，在我身后百米左右，有两个身穿我军士兵服装的日本兵，也骑自行车来冒充是我的传令兵，闯过了我军岗哨，快速追赶在我的后面，用最大力气向我猛冲，企图把我冲到桥下，淹死在永定河急流中。我与鬼子激烈拼搏，我守桥士兵飞速赶来增援，才把两个鬼子生擒，押送到宛平城里，由第三营部关押。到军部后，见到了副军长董麟阁，绥署参谋长周思靖与冯师长，他们先对我们在芦沟桥和宛平城的战斗，作了肯定。认为大家已初步具有独立作战能力，每战都能把握战机，克敌制胜，今后应当发扬光大。然后，他们又征询在前线的官兵对战局有何看法和建议。当时我想我是参谋人员，理应有话直说，便提了一句：“我军似应转为北向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应利用交通线，将军民转移在我军后方，为我长期所用。”我说完后，他们对我口授任务：“现有重要部署图表及密电码，和用火漆封闭的几封绝密文件，要求以十万火急送到天津，交张自忠师长亲收。我受命后，立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临行前，他们又口授：“你们师应广泛出击敌人，以牵制敌之西进。”

我回到家，准备即刻启程回津。在出发前，立刻想到过丰台最危险。如此重要文件，一旦被敌查出，人死是小事，损失之大将无法估计。我正处于心急如焚之际，我的父亲即刻叫我换上老百姓衣服，他要与我一同上火车，掩护我回天津。过丰台时，日寇巡查队疯狂万分，拖住多少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要带走。我和父亲表面装得镇静，心里万分紧张。但紧张也得上车，于是趁乘客们上下车混乱时刻，把装有文件和我的军装的麻布包一闪眼塞入车厢角落座位底下深处，心里

想：只要日寇胜利冲昏头脑，新定中国人不敢在他们鼻子底下冒险就好了。几个日军经过一番咆哮示威，正在与另外几个乘客发生争执，又要捕人时，火车已开始启动了。鬼子跳下了车。我们的文件和人才脱离了虎口。火车向京津铁路的大站廊坊开过时，我们对这几日瞬息万变的廊坊情况已很不明，不知日寇是否在廊坊站也搞巡查，我带着很大的疑虑，进入了廊坊站。举目一望，才知道廊坊还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我和父亲会心一笑，因为已进入我军势力范围。我父亲下车后，准备乘回头车返北平，父子挥泪离别。从此我追随张自忠将军，一去八、九年，与家里音信不通。直到最后抗战胜利！

火车到了天津站，我在车上一眼看到日军已插手天津站的巡查，心情一下又紧张起来。心想如文件最后被日寇抢去，岂非前功尽弃，全部计划都将付之东流。

由于火车在天津站还暂时不开，我向车外作了一番审视，才发现天津的巡查，仍以我三十八师为主。于是我下车大喊：“三十八师卫兵快来保卫我到你们卫兵司令室，我有重要公事要见你们的卫兵司令！”当时士兵全副武装，应声而来。同一时间，日寇巡逻兵亦闻声赶到，企图抢先检查我的行李包，当即被我方巡查队用大刀和机枪挡退。在我出示了我师证件后，他们加强了警戒，立刻打电话由市政府派了配有武装人员的小车将我接到天津市政府，见到了张自忠将军。我将文件呈上，并陈述了芦沟桥的战况，和副军长董麟阁将军口授的一些军机大事。张师长还未及看完文件，便说：“你能舍死忘生，完成任务，记一大功！”最后师长叫我休息两天，马上去到驻津各防区，继续进行联络和在战斗中的协作等工作。他一向最关心部下的成长，身居将军地

位，仍然诲人不倦，谆谆告诫我，当军人要以刚强、沉着、热心、慧敏要求自己，但也要注意人身安全。

7月中下旬，经常有平津两战区敌我双方战报送到司令部来。天津方面，海光寺日本驻军司令官山田骏和火田参谋长，密令其特务机关，限期刺探到我军总的作战计划，以便增加日军，发起新会战，做到对天津抢先发动攻击，以策应西线进逼北平。北平方面日军大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都已集中到丰台附近，准备对北平总攻。日军已攻占了我方大井村和五里店几个村落。日军增兵，继续强攻宛平城、芦沟桥、长辛店，我军伤亡甚众，吉星文团长和孙培武大队长均受伤。

7月25日，日军以重兵攻下了团河。同日，由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增派来的一个日军联队，在机关枪、大炮、铁甲车紧密配合下，向廊坊进攻，受到我三十八师刘振山旅的迎头痛击。7月27日，北平我军调整部署完毕，军长宋哲元下令28日平津全线发起总攻击。南苑总指挥由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担任。冯治安部队由芦沟桥、八宝山出击五里店、大井村之敌，以后残敌向丰台溃逃。董升堂部队，分兵对由廊坊东西方向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确保了交通线与附近阵地的安全。当日拂晓，日军首先出动飞机五十多架次，对我南苑炮兵主阵地和数千间营房进行轮番轰炸，并指挥其炮兵对我实行疾风射击和破坏射击，再加双方士兵决战拼搏，南苑战场战况惨烈，我官兵伤亡严重。刀枪大炮大部分失灵，营房阵地变为一片瓦砾，鬼子的人头散落沟壑。

南苑自古就是北平屏障。是天然和人工的要隘。我军为保住文明古都，不受日寇的破坏，选择大红门与南苑作为歼

敌主战场。个个奋不顾身，用鲜血涂染得大红门更红。

我军董麟阁副军长在此壮烈牺牲，赵登禹师长在此地指挥，也为国捐躯了。在战斗中最激烈的时刻，我全体军官团、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军部特务团，在刀山火海之中，与敌拼搏，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愧为抗日救国的英雄，为抗战大业，做出了贡献。

7月28日，在天津的我军，侦察到日寇将在这一天配合驻北平侵略军发动总攻击。张师长下令，命我天津驻军和保安队集中优势兵力，抢先发起攻击，使敌人形成被动局面，使其各兵种一时协同不起来。凌晨，天还未亮，我军即打响了先发制人的攻击，首先对天津东局子日寇飞机场进行偷袭。我士兵分层剪断了机场周围的铁丝网，然后一举冲到停机坪。在机坪上停放的十八架飞机，准备天一亮就起飞执行轰炸任务，我官兵搜索到如此重要的军事目标后，在每架敌机上，都浇洒上汽油，然后指挥官一声令下，全部付之一炬。一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鬼子乱成一团，我士兵乘机撤回阵地，对敌实行猛烈射击。

当日我驻在天津市区部队，到处发起攻击。我军首先占领火车东站和北站，在日租界攻击了日军司令部、警察署和日本领事馆等机关。同一时间，我野战军又强攻了日寇经营多年的海光寺大本营老巢。在我三十八师士兵锐不可挡的冲击下，终于使这座号称“铜墙铁壁”的堡垒陷于瘫痪。

7月底，我沿海河的驻军，除加强河防外，以一部转战在杨柳青、静海县地区加强天津外围的防守并保障津浦线的畅通。

同一时间，从战报上得知，军长宋哲元、秦德纯率军司

令部，从南苑转移到保定后，继续指挥作战。

此后由于国共合作，救亡运动进一步得到推动，抗战到底的决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八年的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最光辉的篇章，也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七·七事变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参加抗敌的老战友都已年逾古稀了，我相信，当年同生死、共患难，取得胜利，其经验只有一条，就是加强团结，奋斗到底。在这欢庆反法西斯胜利和抗日胜利50周年的时候，大家共同祝愿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把祖国变得繁荣富强，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七·七”事变亲历记

王景禄

我原来的名字叫王明，原籍河北省石家庄市。在我参军前，我曾经是设在石家庄市的一所私立法文学校的学生。读了半年左右的法文，我再也无法静心学习了。当时的华北已有一半被日寇鲸吞，无时无刻不看到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谁能对此无动于衷，熟视无睹？何况我还是个青年，正是血气方刚；喊喊抗日口号，参加游行请愿那些事，我感觉满足不了我的心愿。我要去当兵，面对面与东洋鬼子进行血肉的较量。于是，我悄悄一人溜出了学校，瞒过了家里，跑到了当时驻扎在张家口的29军部队。我家是大地主，发迹是在我叔父那辈，他曾在孙传芳手下任过师长职，有了钱就置田买地发起家来。家里人希望我读好法文，将来好在当时法国人开的正（定）太（原）铁路上谋份差事。我跑了，他们到处找。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招兵的多的是，我记得何应钦就曾招兵运往南方去打共产党人。我不当这种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所以我专投打日本人的军队。

我参加29军后，分在37师（师长冯治安）110旅（旅长何基津）219团（团长吉星文）3营（营长金振申）12连（连长王玉生）2排（排长石玉山）6班当士兵。这是1935年正月间的事，我当时还未满20岁。那时候当兵是苦得很的事，不是俗话说：“好汉不当兵”的嘛！为了抗日，好汉当兵的真

不少，记得我们排还有个大学生兵，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据说是个地下党。29军的军事训练格外严格，对每一个士兵不但要求军事技术好，而且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五个月的新兵训练我吃尽苦头，但我不仅没有叫苦，而且还取得了新兵训练的好成绩，使得排里的官兵对我刮目相看。他们知道我是大地主出身，总以为我是“应景”、“赶时髦”才来当的兵，要不了几天我准“开小差”；岂不知我是抱定与鬼子拼个死活自愿当兵的，苦算什么！只要能打鬼子，我牺牲性命也值得。说句心里话，要不是日本侵略我们国家，逼得我们中国人无法活了，我肯定不会当兵。

绥远事件后，我219团开往长辛店，我3营奉命来到了宛平城，也就是后来成为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的地方。这里的桥有两座，一座即是被外国人称为“马可·波罗”桥的卢沟桥，另一座则是正（定）太（原）路铁路桥，两桥均跨越永定河。日我双方就隔河相峙。日本侵略军自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后，十分猖狂地以为中国真的成了“东亚病夫”，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好揍过。当然，作为一名士兵，就便是连长、营长一级的，也不可能知道蒋介石的什么“不抵抗主义”政策，我当时已提升6班副班长，只是想着打小鬼子，根本不管他什么生呀死的。这下子，总算与仇人面对面了，看着城外的日本军队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在我国土上如入无人之境，我们一般士兵恨不得马上冲杀，把这些侵略军打个人仰马翻。

机会终于来到了。进入1937年夏，敌我形势空前紧张，日军成天操练，真枪实弹演习，以我宛平城、卢沟桥为假想战略攻坚要地，一会儿攻过来，一会儿攻过去，经常有

枪弹“嘶嘶”响着从我方上空掠过，明目张胆地挑衅。那时候居住在宛平城外的老百姓真惨，天天有人进城哭诉鬼子暴行：他们欺凌我妇女，抢掠我财物，为逼迫我乡亲去为他们修筑工事，日寇竟丧心病狂地往附近各村里的水井里投放毒药，仅留下他们驻地的水井，你要吃水就得先去出苦力修战壕。老百姓家里四壁如洗，全让小鬼子抢掠一空，鸡鸭牛羊全让鬼子宰杀吃尽，棉被衣裤抢了去做了沙包沙袋，门板窗框全给下了去遮掩壕沟、掩体。总之，这是连野兽都不如的兽兵！老乡们活不下去，四处逃难，那才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当兵的，吃的是老百姓种的粮，穿的是老百姓织的布，眼看着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遭受鬼子欺压折磨，心里的难过真是没法提。

七·七那天、说来也和往日的情况差不多。记得当时我们在永定河我方一侧赶修工事，日本鬼子在河对岸操练演习。从我们的目击感受来说，日军的操练似乎比之往日的延长了，规模更大了。营里命令我们加强警戒，不可掉以轻心。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站岗时，只听得河对岸日本兵吵吵嚷嚷的，听不懂是在叫喊什么。我下岗后不久，就听得城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炮声，明明是朝着我方射击的架式。这时，就听我连代理连长，我排排长石玉山（连长王玉生在洛阳受训，七·七后才赶回部队）高声命令各排进入战斗阵地，按照事前的布署我连守卫西门。距我西门西北角一、二百米处，就是正（定）太（原）路，日军黑压压一大片象蝗虫似的顺着铁路向我攻击，说起来日本兵也太不把我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按军事条律规定的掩蔽前进，一个个干脆直着腰，挺着胸，好象是刀枪不入似的。我方士兵可

没有被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吓住，这种活靶子在实战中可是不多见，随便瞄准，扳机轻勾，“啪！”一下撂倒一个。我头一回打仗，又是机枪手，那才真是叫“过瘾”。我手中的机枪也似乎特别听话，特别卖力，“咕咕咕”欢快地向着敌军喷射着复仇的火束。当晚有多少敌兵死在我的枪口下，无法确知；也无法去统计，我只知道傲慢骄横的日兵象潮水般退了回去，又象潮水般涌了上来，日方专门用两挺重机枪来压我的一挺轻机枪，可我们的轻机枪搬动灵活，一会儿出现在左边城墙垛，一会儿出现在右边城墙垛，日军的重机枪也奈何不得。我后来才发现，我的机枪已经打得枪筒发红，汗珠子掉上去，“滋滋”响着瞬间就蒸发干净。我想方设法又找着个新枪筒挨上去，可没有打上几个弹夹，枪就卡壳了，真叫人沮丧。这时，副营长耿大嘴（绰号，姓名我想不起来了）要带我排去夺回被敌占领的卢沟铁路桥，不知什么原因，被金振中营长阻止，不让去。后来听说吉星文团长为此骂了金营长一通，说他贻误战机。吉星文团长大约是当晚子时左右率一、二营由长辛店驰援宛平城的；我们士兵最佩服的就是吉团长，那晚他在城头阵地视察敌情，被敌炮弹皮擦伤了额角，他象全然没有这回事似的，仍然奔走着指挥作战部队。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1、2营拿回了卢沟铁桥，那全凭我军士兵手中的大刀斩尽顽敌才取得了初战告捷的胜利。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非但没有攻进宛平城，反而损兵折将又退回到了他们的驻地。战斗来得猛，去得也快，临近天亮时也只有零星星星的枪声了。日军损失惨重自不必说，我方伤亡也够重的，仅以守卫河堤阵地的11连来说，战斗结束一清点，集合站队的只有原来的一半人了。11连的机枪手张德发，河南人，

跟我是好朋友，我俩在机枪训练班时，总是形影不离。七·七那晚，他是第一个牺牲在日军枪弹下的我方士兵，当时他正在铁路边站岗。次日，我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我排排长石玉山也负了伤，送到军医院治疗去了。我们最大的欣慰就是卢沟桥、宛平城没有丢，仍然屹立在我方防区，这恐怕是日军侵入我国后碰到的第一块卵石。次日日军派了飞机来轰炸扫射，地面军事行动基本停止。听说，我方王冷斋县长与日军头目展开了交涉，而我军则积极备战，全营官兵的大刀统统集中起来，由火车押运至长辛店机车厂用砂轮打磨刃口，准备让贼心不死的日寇尝尝“板刀面”的滋味。后来还发生了件事，据报旅长何基沣被敌围在南苑至宛平城的半路，吉星文团长火速率兵去救，结果在路上两边相遇，才知是虚惊一场。我个人参加过的战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七·七晚上的血战了。后来的战斗就有些令人失望了，尤其是在南北徐州会战，我军各地部队穿戴不尽统一，服色不一；口音方言不一；记得有一次我军与一支来自两广的部队交上了火，就是听不懂广东话，误认为是日本话，加上他们那身黄军装；我们当然要开枪。这主要是上边的指挥失误。我在此次会战的南平集战役中，右膀被日军击中、送到医院养伤，从此就基本离开了抗日的主战场。我记得我们从宛平城撤下来，心里真纳闷，干嘛不直接打过去，把日本鬼子赶回东洋去？！那时候国民党的兵，是根本不知道上级的心理的，叫打就打，叫走就走，哪象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作战，怎样作战交待得清清楚楚。所以，打起仗来才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王延峰 整理）

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一八四师

禹王山阻击战

李 佐 赵汝懋 常绍群

1938年4月21日，敌军即以主力坂垣、矶谷两个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约三万余人再犯台儿庄，不到旬日就攻到台儿庄东北四户镇、小良壁、兰城店以北之线，我台儿庄正面守军第一线的于学忠、汤恩伯等部，阻止不住日军的猛攻，台儿庄危在旦夕。六十军原来是驻在鄂北、豫南一带整训的。4月17日军部转来蒋介石的命令，开赴河南的民权、兰封一带集结，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接着，李宗仁眼看台儿庄不能守，徐州将岌岌可危，即电蒋介石要求调六十军到台儿庄参加作战。因此，我们的列车于4月20日开到兰封车站时，李宗仁派联络参谋到民权、兰封沿途车站，向六十军先头部队传达命令说：“奉蒋委员长电令：第六十军直开徐州待命，不许中途下车；‘每一列车，只准停留十分钟’。接着就送来箠席袋装的馒头和四川榨菜，一大包一大包的搬上列车来给我们食用。因而，我们没有停留，于21日夜到达徐州。军长卢汉是21日上午坐专车赶在部队先头到达徐州的，见到战区长官李宗仁、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李宗仁命令第六十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部队速到运河北岸台儿庄东北地区集结。白崇禧在旁插话说：“六十军最好在24日前集结完毕。”卢汉军长又去找孙连仲联系，孙命六十军集结在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右侧背邢家楼、陶沟桥、